

开拓与新思

——评《嘉庆帝传》

王雪华

嘉庆皇帝颙琰,是清王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五代皇帝。他在位25年间,正是中国社会政治兴废、传统变更的一个关键时期。然而,在清入关后十朝中,嘉庆朝又最为人们所忽视,因而论述极微。由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、关文发先生撰著的《嘉庆帝传》一书,于史学的贡献正在于填补了对嘉庆一朝进行系统研究这一空白,揭开了尘封的史料中一个真实的嘉庆帝,是一部确实耐读的帝王评传。全书共9章,47万字。读过《嘉庆帝传》全部文字,细加品味,我以为可以获得下述三点认识。

一、议论持平切实,自成一家之言。(1) 关著指出清朝中衰的根源,在有“十全武功”之称的乾隆帝,不在嘉庆帝。嘉庆一朝之具体史实,历来学者问津者少。嘉庆的形象在人们意识里也一直是不好的,好像清代的中衰全由这位帝王一人造成,就连他在其父逝世后的第16日抄斩和珅,也被人们视作“和珅跌倒,嘉庆吃饱”。实则清朝由盛到衰的历史转折孕于乾隆一朝。有力的证据便是“十全武功”背后的巨大代价、南巡之类巡游的肆意挥霍、宠信和珅以致上下官吏贪墨成习、军事力量的腐败和军备的废弛。因此,关先生提出,清朝中衰的时间是在乾隆后期,而不始于嘉庆。事实是,嘉庆于新政后,无时无刻不在矫正乾隆后期的弊政。(2) 关著认为诛和珅的目的,不是在经济上应急,而是政治上力图治本。和珅被诛100多年来,民间以及不少学者均于有意无意中透露出嘉庆斩和珅与其家财有关。学者邓之诚甚至有“是时军饷告竭,欲得其家财以贍军”的认识。作者认为,通常所谓和珅家产总值“八百兆有奇”,只是推测与估计,实不足据,何谈“吃饱”,况且军费为国家正项开支,解决的途径很多,大可不必在皇考大丧之日亟兴大狱,以嘉庆帝平素之言行也决不是斤斤计较钱财的短视昏君。“经济”说很容易流通,但未必属实。诛和珅一案,显而易见的是它的政治含义。和珅之行状决非孤立现象,而是乾隆朝后期吏治混乱、贪墨成习的最集中反映。亲政后的嘉庆帝为了肃纲纪、促“军剿”、安民心,故有诛和珅之举,这是嘉庆初政中极漂亮的一仗。作者认为,嘉庆对和珅一案的处理很有分寸,而且相当宽容。应该肯定,“政治”说较之“经济”说更符合嘉庆之原意,可为定论。(3) 关于嘉庆帝既整饬吏治而又更治未肃的原因,作者提出嘉庆帝在勤政与实政方面,并不逊色于同朝前几位皇帝,同样也严于自诫,如禁止各省督抚大员进呈宝物,大小事项崇俭黜奢,更为肃清纲纪而斩和珅。然而,嘉庆帝于整饬吏治有心无法,既如和珅一案虽称迅捷果敢,但对和珅集团中人处理过轻,实则“诛和珅以肃吏治”,未获实效。作者比较了嘉庆帝查处的若干大案要案,如云贵总督富纲贪赃案、云南巡抚伊桑阿贪贿营私案、吏部书吏舞弊案等,认为所查案件不少,而吏治终究没有太大改观。在此,作者提出了一种思考:嘉庆朝吏治之不肃决非偶然,关键是嘉庆在“正己”外,尚未真正找到“正人”的有效途径。他所器重的是守成型的大臣,他们犹如一支除弊灭火队,哪里起火就哪里扑,缺乏积极有效的开新举措,而嘉庆本人心慈手软,遇事往往有法不依,执法不严,宽纵有余,终使一朝吏治欲肃而未肃。(4) 关著提出了对嘉庆全面评价的问题。作者从求实精神出发,对嘉庆的是非功过作了开拓性探讨。他认为,嘉庆作为一国之主,没有成长为出色的政治家,是由于缺乏政治家观察事物的战略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,因而在经济政策上墨守成规,在对待自然科学与外来思想方面固执而封闭,在内政上和他的祖父辈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相比,

没有突出的建树,并且对事物的判断缺少整体观念,因而总是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。但是,嘉庆毕竟对乾隆后期中衰之势有所认识,作了力所能及的匡救,仍不失为历史上有作为的封建帝王;他以自己的儒学涵养,身体力行,在勤政戒惰、崇俭黜奢、体恤民情、倡导实政、反对弄虚作假、不信祥瑞符应等方面都有所成就。嘉庆尽了一个守成之主应尽的责任,却又无法挽回清朝的危局,因为他是一个自律甚于律人的帝王,而非政坛上的铁腕人物,无论换上哪个人物都不可能成功地拯救这一危局。(5)《嘉庆帝传》体现了作者论事惯有的客观冷静的风格。譬如翰林院编修、学者洪亮吉因言获咎事件,作者条分缕析,将此事论述得十分透彻。其一,嘉庆以洪亮吉上书未自具封章而直达御前为籍口,对洪氏以私书形式请人代呈有所不满;其二,言事书中“恐有俳优近习,荧惑圣听”等语刺痛了嘉庆,这是问题的实质,可见嘉庆还是喜欢听颂扬之辞,同样显示了人性的共同弱点;其三,洪亮吉对嘉庆的种种规劝多从实际出发,却被嘉庆指为“狂谬已极”,又对洪氏平日“耽酒纵狂”加以指斥。嘉庆虽于减刑之后,下诏赦还洪氏,而对开通言路已投下深长的阴影。另如乾隆为何宠信和珅,嘉庆初政的特色,嘉庆对邻国事务的外交政策及对外界问题的处理,真正的禁烟始于嘉庆……等诸多问题,作者都有鞭辟入里的剖析,令人信服。作者指出,嘉庆对国内形势多少有些直觉认识,而对世界潮流罔无所和,仍以妄自尊大的“天朝”外交官主宰着清王朝的一切对外交往,全部的危险性就在这里,这是非常深刻的议论,显示了作者把握历史的概括力。

二、考辨严谨有据,学术性强。有关嘉庆一朝历史,学术界存在着不少含糊之说。为了辨其虚实,以求其真,作者不辞繁琐,每一事必详其始末,较多地采录文献资料,免除了东鳞西爪、扭曲原意之弊。因此,作者论由史出,考而后信,使全书有很强的学术性。如过去诸多论者均言乾隆之宠信和珅,是由于其相貌与雍正某妃相似,此妃之死又涉及乾隆之故,作者娴熟地运用了考据的方法,对“和珅貌似某妃”之说提出质疑。其一,雍正此妃之姓氏、封号、卒年,官方史书中缘何不见记载。其二,野史云,弘历因事入宫,见父皇之妃对镜理发,遂以手掩其目,与之相戏。妃不知是太子,惊而持梳向后击之。皇后知悉,立赐妃死。关著提出几个疑点:此妃难道就不怕她所打的人是雍正帝?弘历有静悄悄地溜入皇妃宫帏的可能性吗?作为尚未公开的皇太子,兼有严父管束,他会因小失大、风流任性一至于此吗?此事若为雍正得知,弘历还能稳坐太子席并在日后登皇帝位吗?其三,野史所谓和珅“貌与妃似”、“为妃之后身”、且妃之颈部“指痕宛在”等语,神秘色彩太浓,无法令人相信。对此,关著揭示出乾隆宠信和珅的真实内幕是,和珅有一套特殊的逢迎本领,能博得乾隆帝的好感;由此,和珅获得了乾隆最钟爱的女儿和孝固伦公主做儿媳,凭着公主与附马的关系,乾隆也得对和珅有所迁就;加上乾隆后期军旅之费、土木游观、宴会挥霍等各项,均耗资巨大,而国库经常告罄,恰恰和珅善于筹款,他兼管吏部和户部,常常通过官员去捞钱,形成乾隆索之于和珅,和珅索之于督抚,督抚索之于属吏,属吏索之于百姓的怪圈。乾隆除了需要晓政事、能征战的股肱之臣外,又何尝不喜欢和珅之类使贪使诈的“弄臣”,至于这会给大清帝国、给嗣皇帝造成何等后患,大概乾隆是不愿多考虑的。又如,江南沿海的洋盗活动是嘉庆朝深感头痛的事件。对洋盗首领蔡牵和朱濆活动性质的认识,今日学术界尚存争议。部分学者认为它是一次反清起义的正义斗争,关先生则从对资料的分析比较入手,如剥笋一般层层逼近事物真相。他认为前期的洋盗属盗匪团伙,内外勾结,横行海上,毫无正义性可言,对后期蔡牵的活动则应与前期区别,一是因为越南政府已停止对洋盗支持,二是蔡牵等人的活动虽然始终没有停止其在洋面对往来商船的劫掠,但已部分地转向与清政府抗争。另如陈德入宫行刺嘉庆一事,作者的结论是此人确为佣工,行刺乃起因于神经不正常,背后既无人指使,也非天理教所策划,可知作者客观写实,绝不危言耸听。这种客观的态度加以缜密的写作手法,在书中经常可见。关著对于嘉庆一朝史实的辨别是值得称道的。

三、文辞平易简洁,叙事有方。作者行文,条理融贯,虽博征史料,而其中必具内在逻辑,决无资料堆砌之病,可称叙事有方。而且,语言平易质朴,不故作时髦语;文风简约求真,不流于粉饰雕琢;无论记大事小情,都不失静穆之风,不急于强人同己,体现了作者良好的文风。当然,任何一种学术研究,都只是接近研究对象,而不可能穷尽对象,相信以《嘉庆帝传》为高水准的阶梯,将会引发更多的研究成果。